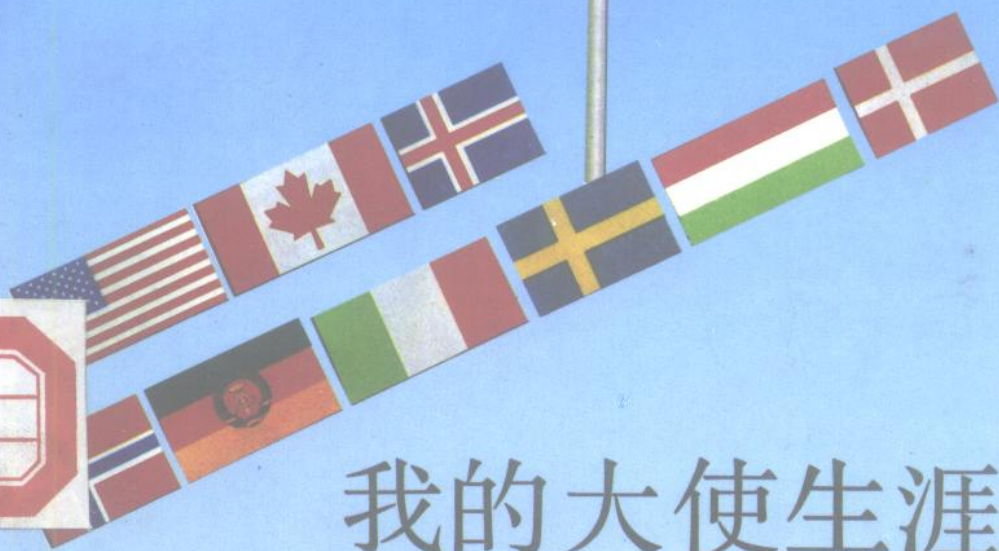


· 新中国大使丛书 ·



我的大使生涯

刘晓 伍修权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中国大使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耿飚 姬鹏飞
副主任委员：陈楚 符浩 宫达非
 秦加林 李连庆 刘述卿
执行编委：余孟仁 蔡玉华 史家骅
 马洪才 吕佳

· 新中国大使丛书 ·

我的 大使生涯



刘晓 伍修权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我的大使生涯
著 作 者	刘 晓 伍修权等
责任编辑	姜克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印 刷 者	苏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页 3
印 数	1—2500 册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154—9/D·206
定 价	12.8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新中国大供丛书》

持节使异域
结谊通全球

耿飚



九三年春

目 录

出使苏联	刘 晓(1)
出使南斯拉夫	伍修权(41)
我的首任大使生涯	曾 涛(66)
悠悠使外往事	申 健(111)
使印琐记	李连庆(145)
“雅典事件”始末	周伯萍(172)
博卡萨称帝前后的所见所闻	李 石(179)
在非洲的日子里	杨琪良(194)
摩洛哥漫记	白 认(226)
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	许文益(261)

2302/3402

目 录

中老建交与首次出使老挝	刘 春(283)
驻坦桑首任大使的追忆	何 英(301)
出使马达加斯加二三事	田志东(314)
我同莫桑比克领导人的友好交往	王 浩(323)
出使巴西记事	张德群(332)
圣马力诺共和国见闻	黄玉平(339)
出使异域画中情	李善一(347)
出使乍得、利比里亚、博茨瓦纳记事诗选	王人三(353)

出 使 苏 联

刘 晓

赴苏疗养

我是 1954 年受命担任驻苏大使的。这以前,我曾去过苏联。

那是 1952 年,联共(布)十九次代表大会前后,10 月的北京正是秋色正浓的日子,我和张云逸同志同去苏联疗养,坐的是国际列车,没带翻译和秘书。进入苏联国境后,换了苏方餐车,晚饭点菜就发生问题,闹了笑话。等了两小时还未来饭菜,找到同车的我国留学生来帮忙翻译,才解决了这一难题。我们抵达莫斯科,由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来车站迎接,住在高尔基大街苏方招待所。我们首先和我国驻苏联大使馆联系,看望了张闻天大使和夫人刘英同志。

当时我党中央派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出席联共(布)十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团员有李富春、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刘长胜。我们看望了代表团,正好遇上越南代表团团长

0005667

胡志明主席。胡主席在看望了我党代表团后，说一定要见一下随团来莫斯科的夫人同志。当时陆瑾、张茜、王光美同志都到了莫斯科，我的妻子张毅也随我去了莫斯科。胡主席亲切、热情地问了她们在国内担任的工作，表示很尊重她们。

因我和张云逸同志是来苏联治病的，故未被邀请出席苏方在克里姆林宫的国宴，只是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大会，坐在二楼苏联领导人的包厢对面。一眼望去对面包厢内斯大林同志坐在靠右的一个座位上。他很少和其他领导人交谈。苏方也邀请我们第二天上午去红场观看了检阅，所以又看到了斯大林在检阅台上的侧影。这位对苏联革命、建设与卫国战争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给我的印象是庄严、引人尊敬。

在此期间，我们除去克里姆林宫医院检查身体外，还作些市内参观。十月革命节庆典过去后，我与刘长胜、刘亚楼同志住入了莫斯科市郊的巴尔维哈政府疗养院，张云逸同志和陈毅同志去了契斯洛夫斯克疗养地。我在巴尔维哈疗养院一期治疗后，又去索契海边，在原帝俄时代沙皇别宫改建的疗养院治疗了一期，就回莫斯科，后和饶漱石、陆瑾一起坐火车回国。2月底3月初去杭州，3月5日得悉斯大林在两天前去世的不幸消息。斯大林的逝世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关于联共（布）十九大，以我当时在苏的见闻略述如下。

1952年斯大林建议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到那时为止，因为战争和其他一些原因，已有13年没开党代会了。从1939年起，中央委员会也已有好几年没开会了。斯大林是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的。十九大定在1952年10月召开，斯大

林指定马林科夫作总结报告，赫鲁晓夫作党章报告，萨布罗夫作五年计划报告。斯大林考虑把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提拔起来作为继承人。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不能在讲台上站那么久，只在大会结束时作了六七分钟讲话。但他仍能在大会上讲话，仍能继续工作，他自己还是很高兴的。

斯大林没有叫莫洛托夫或米高扬作总结报告，虽然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比马林科夫高，甚至在战前担任领导职务的有些人也认为莫洛托夫是将来的领袖、斯大林最可能的继承者。当时所到之处办公室内挂的像，除斯大林外，就是莫洛托夫了。

斯大林建议成立 25 人的扩大主席团代替政治局。新主席团成员中，虽包括了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但斯大林又建议由 9 人来组成常务委员会，成员有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以及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被排除在外。斯大林又从 9 人常务委员会中择 5 名为核心成员，除他本人外，通常被邀请参加的是马、贝、布、赫四人，据说，斯大林很少邀请卡冈诺维奇或伏罗希洛夫，绝不邀请莫托洛夫或米高扬。这个核心集团的安排导致以后苏共几次重大事件，如贝利亚事件，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正面冲突的所谓反党集团事件。

当一个友好大使

1954 年 9 月，我在浙江莫干山接到潘汉年同志的电话。他受陈毅同志委托，通知我中央决定让我出任驻苏联大使。陈

总当时已调中央任副总理，主管外事。我回到上海后，陈总为了把此事最后定下来，亲自打电话告诉我中央决定并征求我本人的想法，我表示同意。我于1955年1月赴北京报到。抵北京后，我和张毅被接到中南海下榻，中央对驻苏联大使这一工作极为重视。临走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找我谈话，交代任务，作指示以及提醒应注意的事项。

陈毅外长当时指示我说：要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深入开展对苏联的工作。

毛主席是在我临走前两天召见我的，地点在主席的办公室。我一进门先向主席问好，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并说这个任务十分繁重，我担心难以胜任，希望主席多作指示。主席说：“让你当驻苏联大使，我们是仔细考虑过了的，中央认为，你是能够胜任的。”接着，主席就对我作了原则指示，说苏联对世界革命起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中苏关系，加强中苏友谊对我们国家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建设，我们需要苏联各方面的帮助。指示我去苏联后言行要谨慎，有重大问题要请示国内，要我重视中苏关系，当一个中苏友好大使。

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席强调我们要认真研究苏联的外交政策。

谈到苏联国内问题时，主席说，苏联的政局还在变动之中，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是否能巩固，还要看今后发展情况，希望我们注意观察，利用在第一线的有利条件，多和苏联各方面人士接触，特别要多和赫鲁晓夫接触，把第一手的材料报回来。当时我很注意主席对赫的评价，但主席对赫本人始终未作

任何评语。

1954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总理约我到他住所谈话，并指定张毅陪同。我们进入总理会客室后，稍作寒暄就开始正式谈话。总理说，你们要去苏联工作，在中苏关系上我给你们交个底。这次谈话不要作记录，用脑子记。总理稍为挪动一下身子转向张毅说，今天把你也请来，因为你的年龄比刘晓轻，记忆力好，可以帮助刘晓记在脑子里。

总理说，关于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一些问题，因为时间相隔太远了，这次就不谈了，我从解放战争谈起。1948年斯大林派人来到西柏坡，主要是为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的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呆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作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总的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也持保留态度。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当然，中共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费了一番力的。主席为此在苏联耽搁很久，主席

表示一定要签,不签这个条约,他就不走。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他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这是好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苏建交以来的这几年两党两国关系是好的。苏联援助143项工业项目,包括新疆的合资公司,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苏联还派遣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培训我们的技术干部和接受我们的留学生及进修生。这是只有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才能做到的。

总理还说,我们建国不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很少,所以我们要向苏联学习,五年计划需要苏联的援助,驻苏联使馆的工作要本着友好合作精神进行,要巩固中苏友谊,发展两国关系。

总理指示我要根据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同苏方进行广泛接触和合作,多做友好宣传工作,说今年正值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这是一件大事,建议我赶去主持庆祝活动。并说我去苏联,他们一定会很欢迎我的。

按总理指示,我在北京未作久留,很快就乘飞机赴苏,争取在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前递交国书并主持庆祝活动。张毅乘坐火车赴莫斯科。这样我就开始了友好大使的使命。

初会赫鲁晓夫

我于1955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6日拜访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我准备递交国书及拜会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等有关领导人的要求。事情进行得很顺利,7日苏方就通知我递交国书。随我去的有政务参赞温宁、商务参赞李强、武官

韩振纪、参赞李汇川、翻译阎明智。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接受国书。陪同人员有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远东司司长费德林等人。递交国书仪式完毕后，伏罗希洛夫把我和翻译阎明智引入边房谈话。其余的人均留在原地等候。房间里备有茶点。坐下后伏表示欢迎我当驻苏联大使并愿和我多方面进行合作。他对中国革命胜利讲了一些好话，并请我向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好。我作了友好表示和感谢后就辞别。伏一直拉着我的手送我出门，握手时还说，我的体力不错，手很有劲。总之，伏尽量把气氛搞得很活跃。

我还拜会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元帅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等。

我作为驻苏联大使代表国家，我又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授权代表中共。为了今后同苏共中央打交道，我带着党中央刘少奇署名的党的委托书，我把委托书交给了苏共中央机关。我抵苏后一个星期，赫鲁晓夫即接见我，谈话是在苏共中央赫的办公室进行的，为时约一个小时。

赫鲁晓夫多次赞扬中国，以示友好，说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战胜了种种困难，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正大踏步前进，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显示了新中国的力量。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苏共把中共看成是亲密的兄弟党。中国驻苏联大使会受到苏联人的尊敬并得到照顾，这是理所当然的。赫最后还说，中国使馆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可直接向苏共中央提出，苏方一定会认真协助解决。

由于初次见面，我没有向他提什么问题，只感谢他对我友好接待和关心，并表示将竭尽自己力量来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和联系。由于他提到了朝鲜战争问题，我就谴责了美国的种种侵略行径和阴谋颠覆活动，并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击败了美军，但我们对美国仍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我还讲了一些对苏联友好的话，作为对他赞扬中国的回报。最后我表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将同苏联合作和配合。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坦率地同苏联商量，交换意见和向他们请教。这几句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讲的，也作为我这次同他谈话的政治结束语。他听了我的话显得很高兴，忙说我们要相互帮助、相互配合。你来的时机很好，正值中苏友好条约五周年，我们要把这个庆祝活动搞好。告别时，赫还再次表示，有问题可向苏共中央提出来，他们将帮助解决。

彭总在莫斯科

1955年华沙条约国曾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彭德怀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的亚洲形势与背景是：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搞了个以三八线为界的停战协定，但正如彭总和赫鲁晓夫谈话时讲的：“朝鲜局势还不稳定，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受到朝鲜半岛局势的牵制。”朝鲜战争时，美国大搞战争边缘政策，宣布“保护”我国的台湾省，并调遣第七舰队摆在台湾海峡。这就存在着美国伙同蒋介石在我东南沿海进行侵略进犯的可能性，而我国当时军事力量还处于较弱的情况。

彭德怀同志对苏方的战略思想是非常清楚的。过去，他曾两次跟我谈起过中苏有关战略思想的分歧。当我于1955年赴

苏前，曾去向彭总辞行。我说：我这次担任驻苏大使是党对我的最大信任。他说，我担任这一工作是胜任的。要我多关心国防部与苏联国防部之间的一些工作关系与联系等。1956年我回国时，又到彭总家中看过他，我主要谈了一些苏联在二十大后的情况。他所谈的主要是他和朱可夫在战略思想上的分歧。他也讲了些国内情况。1957年，我又去他家看过他。他在简要介绍一些国内情况后，又谈到他与苏联国防部有关战略思想的分歧。谈话时他拿了一份国防部的文件对我说，这是一份我国国防战略方针的草案。

这一次彭德怀代表我国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代表团顾问有方毅、王炳南、肖向荣、陈楚，随员有雷英夫。我因适遇金日成首相来莫斯科要参加苏联、朝鲜双方会谈（苏方要求中方以第三者参加），时间冲突，没法抽身去机场迎接彭总，就决定除由温宁参赞、韩振纪武官去机场外，还要张毅一起去机场接彭总。张毅对彭总不仅熟悉，而且还可算是他的老部下（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毅因在西北救国联合会搞公开工作，身份暴露，曾撤退到彭总所在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彭总抵莫斯科后，即驱车往苏维埃旅馆休息。我从金首相那儿出来，即赶去见了彭总，他随即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国防部文件，让我看一下，要我了解此次华沙要讨论的问题及我方的态度。

彭德怀在莫斯科停留期间，赫鲁晓夫接见了，在座的有苏国防部长朱可夫，我也参加了。谈话的主要内容大致是：

赫鲁晓夫首先讲了华沙条约国部队的战略意义与北大西洋集团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并说华沙条约是防御性的。华沙会

议议题是保障欧洲和平与合作。将来要在这一基础上促进两大集团搞欧洲集体安全，来缓和欧洲紧张局势，最后达到两个德国同时并存；苏联要提出裁军方案，提出苏联与西方大国协议裁军比例；苏联将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将把驻奥地利苏军撤回，在这问题上苏内部有意见分歧。赫鲁晓夫介绍了苏联新式武器的发展和威力，特别讲到大型远程轰炸机与空对地、空对舰的导弹火箭，并表示可以放映这方面的电影给彭总看（几天后在克里姆林宫放映了）。彭德怀对上述武器很予重视，赫鲁晓夫当时说可以考虑用这些武器帮助中国。

赫还谈到希望中国也能裁军，从政治上配合苏联，并说现代化军队不在于数量，而取决于是否装备有现代化武器。赫谈到即将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说美国目前还是很强大的，要以和平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赫又向彭德怀探问我国对台湾斗争的方针，赞扬了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功绩，说彭有军事天才，是杰出的军事家。赫接着又讲了南斯拉夫问题和苏国内的一些情况，也问了一些我国的情况。

彭德怀认为应该和缓国际局势，中国也需要一个平时时期来进行建设，来训练与整编军队，建立国防工业和加强沿海国防工程。彭要求苏联在这方面予以更多的帮助，特别是海空军的建设，增加军事顾问和专家的派遣。

彭德怀表示中国也要并已经在裁减军队，不过现在太平洋地区敌人威胁还很大。赫鲁晓夫表示华沙条约不仅对西方也是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如通过加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各种措施来实

现。赫鲁晓夫说，苏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是用什么形式使之合法化，以便于运用这些力量。彭德怀表示将向中央请示研究这些问题。

彭德怀离莫斯科前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以示对苏方招待的感谢。当时只请了国防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一级的人。在宴会即将开始时，苏方通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主席团委员要来参加宴会，而且很快就来了，苏方对彭总很尊敬。赫鲁晓夫即席讲了话，赞扬中苏两国友谊，并称彭是当代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华约会议后，彭德怀回国路经莫斯科，赫鲁晓夫再次接见了彭总。彭总说：华沙条约国会议对稳定当前国际局势，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是个及时的重要的措施。他说，中国还有台湾没有解放，朝鲜局势还不稳定，还面临着美国的严重威胁。美国和蒋介石也有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侵略、进犯，我们虽然有准备，但我们的国防力量还需要有个时间才能加强，我们的部队还需要加强，特别是空军、海军力量较弱，是我们薄弱的环节，沿海国防工程的建设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国防基地才能比较巩固，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受朝鲜半岛局势的牵制。

赫鲁晓夫说：感谢中国对华沙条约的支持，特别是彭能亲自参加，这是中国支持的最有力的表现。他认为欧洲和远东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美国指使蒋介石搞冒险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在朝鲜也不能排除这种威胁。但是有苏联的强大力量，有华沙条约国的强大力量，他们是要考虑的。